

发达经济体应出台鼓励和支持就业的政策

作者：[Francesco Grigoli](#)、[Zsóka Kóczán](#) 和 [Petia Topalova](#)

2018 年 4 月 9 日



老龄化可能会减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图片：Zero Creatives Cultura/Newscom）。

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增长正在放缓，预期寿命在增加，老年人的数量也在飙升。由于大龄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较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使经济增速放缓。在很多国家，这也会威胁到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但正如我们在 [2018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二章](#) 的研究所示，通过让有工作意愿的人们参与工作，政策还有很大余地来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显著的差别

过去十年中，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步伐都大大加快，这是因为二战后出生的庞大人口已开始到达退休年龄。对于一个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而言，其抚养比（6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与 20 岁至 64 岁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已从 2008 年的 27% 上升至目前的 34%。随着人口变动趋势加快，预计到 2050 年抚养比将上升至惊人的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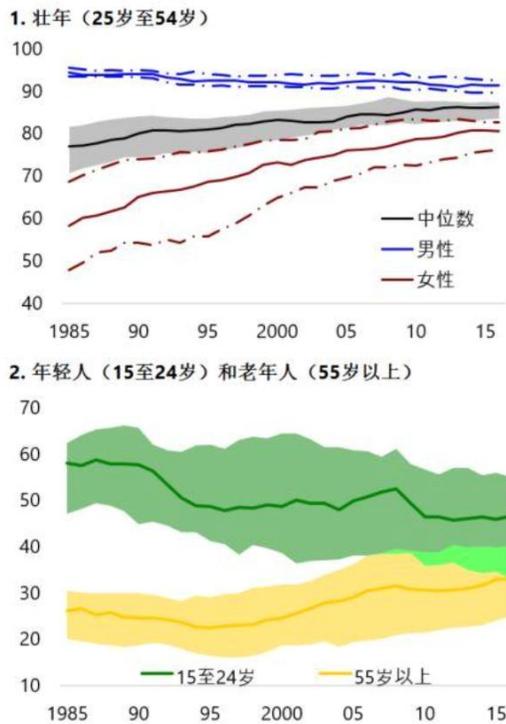
但尽管老龄化已对劳动力供给造成了压力，但各发达经济体总体劳动力参与率（定义为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包括正在工作以及寻找工作的人口）的演变和构成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例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急剧增加。最近，大龄劳动者的参与率也显著提高，而年轻人的参与率却有所下降。在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中，壮年男性（特别是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正日益脱离劳动力队伍。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同，美国的壮年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劳动力参与率双双下降。

显著的差别

发达经济体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劳动力参与率变动趋势存在巨大的差异。

（劳动力参与率，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百分比）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计算。
注：实线代表中位数，阴影代表第25至第75个百分位数的范围。绿色和红色实线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的中位数。小图2中，虚线分别代表了男性和女性的第25至第75个百分位数的范围。



各种力量均发挥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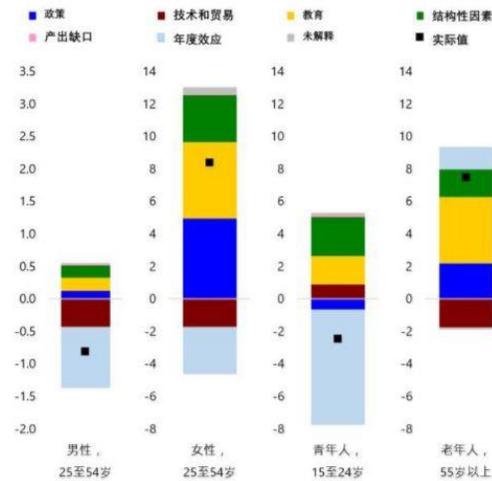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在各国及各劳动者群体不同趋势背后的各种力量。我们分析了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参与率的总体和个体历史情况，定量分析了各种因素在人们是否参加工作、

是否持续工作和是否重新工作的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包括老龄化与经济周期、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和体制、结构性因素（如服务业的兴起）以及对全球性因素（如技术进步和贸易）的敞口和稳健性等。下图展示了对于发达经济体平均而言，上述因素对各群体劳动参与率变化的贡献情况，时间跨度为 1995 年至 2011 年。

主要因素

自动化会对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参与率造成影响。但对壮年女性和大龄劳动者而言，在教育和政策上的改善更多地抵消了上述影响。

（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平均贡献，发达经济体，1995年至2011年，百分点）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计算。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老龄化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过去 10 年中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但同期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则表明，在改变劳动力供给的决策方面，政策可以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抵消老龄化的影响。

我们发现，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和制度——如税收福利制度、积极劳动力市场计划（如培训）方面的公共支出、旨在鼓励特定群体参与劳动的政策以及教育程度的提高与结构性的改善——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过去 30 年壮年女性和大龄群体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幅上升。欧洲出台了更多的支持性政策，且欧洲壮年女性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这也解释了为何其劳动力参与率趋势相对于美国存在显著的差异。

相反，自动化虽然对整体经济有利，但却影响了大多数群体的劳动力参与率，其在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比欧洲更为持久。我们发现，当前或之前的职业受自动化影响较多的群体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明显更高。但令人鼓舞的是，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力市场就业匹配过程的政策可以部分抵消这种影响。在教育和积极劳动力市场计划方面增加支出，以

及让人们可以进入更加多元化的劳动力市场，往往能降低自动化和劳动力之间的负面联系。但政策制定者应该注意到，技术进步会给一些部门、职业和地区带来困难的调整。

鼓励人们参与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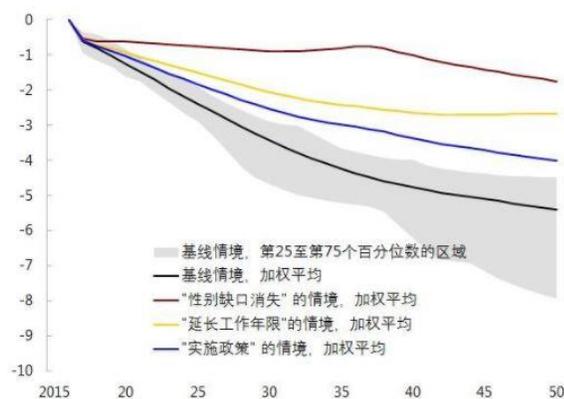
鼓励劳动者工作或继续工作的政策，以及帮助劳动者将家庭与工作相结合的政策，可以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灵活的工作安排以及育婴假，都有利于鼓励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对于大龄劳动者而言，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或提升养老金制度的精算公平性，减少提前退休的激励因素，可能会延长工作年数。但这些改革不应损害其他方面的目标（如弱势群体的基本社会安全网）。

但预计的发达经济体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最终会压倒政策在充分抵消老龄化方面的影响。下图描绘的示例性模拟结果表明，即使完全消除性别差距，总体劳动力参与率仍会最终下降；且若要阻止总体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必须大幅提升大龄劳动者的参与率。引入将那些被视为“最佳实践”（从劳动力参与率角度而言）的政策，可以减轻老龄化带来的部分负面影响。

提高劳动参与率

通过实施旨在鼓励参与劳动的政策，提高壮年女性和大龄劳动者的劳动力参与率，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发达经济体老龄化带来的部分负面影响。

（不同情境下劳动力参与率的预计变动情况，以百分点计）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计算。

注：“性别缺口消失”的情境假设，25至54岁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在20年的时间内向25至54岁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趋同。“延长工作年限”的情境假设，55至59岁群体的劳动力参与率在20年的时间里向50至54岁群体的劳动力参与率趋同，60至64岁群体的劳动力参与率在40年的时间里向50至54岁群体的劳动力参与率趋同。“实施政策”的情境假设，政策向发达经济体观察到水平的第10个或第90个百分位数趋同。

除非技术进步带来生产率的提升并起到抵消作用，否则许多发达经济体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移民政策，以增加其劳动力的供给；同时还应推出政策，鼓励大龄劳动者推迟退休。虽然接纳移民会给东道国带来挑战，但任何遏制国际人口迁移的努力都会进一步增加人口方面的压力。



Francesco Grigoli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经济学家。此前，他曾在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和西半球部工作，并曾于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学者。他的研究侧重于现实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有效性、消费和储蓄的动态、预期问题、不确定性问题、收入不平等和支出效率。



Zsoka Koczan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经济学家。此前，她曾在基金组织欧洲部门工作。在 2013 年加入基金组织之前，她曾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工作。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应用微观经济学、不平等问题和移民问题。Koczan 女士拥有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Petia Topalova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的副处长。此前，她曾在基金组织的欧洲部和亚太部工作，并曾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兼职讲师。她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